

中西
文化关系
通史



国家出版基金项目
NATIONAL PUBLICATION FOUNDATION



下

张国刚 著

从利玛窦 到马戛尔尼

(1500年—1800年)

北京大学出版社
PEKING UNIVERSITY PRESS





国家出版基金项目
NATIONAL PUBLICATION FOUNDATION

中西 文化关系 通史

从利玛窦 到马戛尔尼

(1500年—1800年)



张国刚 著



北京大学出版社
PEKING UNIVERSITY PRESS

目 录

第四编 自西徂东与天朝应对

第十七章 地理大发现与欧洲的扩张 / 435

一、欧洲开辟新世界的动力 / 435

1. 经贸需求 / 435
2. 精神号召 / 436
3. 科技支持 / 438

二、葡、西两国的海上帝国 / 440

1. “保教权”的由来 / 440
2. 葡萄牙经营印度 / 445
3. 西班牙的帝国梦 / 449

三、西北欧国家的远东角逐 / 451

1. 荷兰东印度公司一枝独秀 / 452
2. 英国与法国的势力消长 / 455

第十八章 明清王朝的对外政策和对外贸易 / 462

一、明清王朝的对外政策 / 462

1. 葡萄牙人叩关与嘉靖朝开闭关之争 / 462
2. 福建的禁海与开海 / 464
3. 澳门政策的变化 / 467
4. 清朝前期的闭关政策 / 469

二、晚明前清的中欧贸易格局 / 473

1. 澳门贸易 / 473
2. 巴达维亚贸易 / 475
3. 广州口岸贸易 / 477
4. 白银与明清海外贸易 / 479

第十九章 明清政府与欧洲国家的官方接触 / 485

一、葡萄牙使团 / 485

二、荷兰的努力 / 493

三、福建官府与西班牙马尼拉总督的接触 / 498

四、与俄国谈判 / 502

五、英国马戛尔尼使团 / 505

第二十章 天主教传教士立足中国 / 514

一、耶稣会士中国传教区 / 514

1. 耶稣会进入中国 / 515
2. 耶稣会中国传教区的阶段性发展 / 518

3. 耶稣会士的商业活动对传教事业的支持 /520

二、其他天主教团体在中国的活动 /524

1. 托钵修会 /524 2. 罗马教廷传信部与巴黎外方传教会 /526 3. 遣使会 /528

三、中国传教区的权力之争 /529

1. 耶稣会的内部斗争 /529 2. 耶稣会士与托钵会士的冲突 /535 3. 教廷与宗教修会特权的冲突 /536 4. 教廷与葡萄牙“保教权”的斗争 /537

第五编 传教策略与西学东渐

第二十一章 耶稣会士在中国的传教策略 /541

一、耶稣会适应原则在亚洲的发展 /541

1. 耶稣会的适应原则 /541 2. 沙勿略在亚洲的文化接触方法 /542
3. 范礼安落实日本传教政策 /544

二、在华传教政策的确立过程 /546

1. 阿科斯塔有关中国的传教思想 /546 2. 范礼安构想中国传教法 /547
3. 利玛窦与适应政策的形成 /548

三、利玛窦适应政策的效果 /555

1. 适应政策的运用——耶稣会士与士人交游概况 /555 2. 适应政策的成果——第一批士人天主教徒 /557 3. 适应政策的局限——儒耶冲突下士人的命运 /560 4. 适应政策的外围影响——方济各会士部分接受上层路线 /562

四、适应政策评价 /564

第二十二章 士人社会对天主教的总体认识 /566

一、晚明士人对天儒关系的主流派认识 /566

二、士人对耶佛关系的认识 /571

三、明末国体安危忧虑中的反天主教思想 /575

1. 传教政策变化对士人态度的影响 /575 2. 不道德的天主教 /576
3. 反儒的天主教 /578 4. 反政府的天主教 /580

四、清初历狱折射的排外思想 /583

第二十三章 明清中国人对欧洲的基本认识 /589

一、佛郎机 /589

二、红毛番 /595

三、大西洋 /599

四、华夷之别与人群划分 /607

第二十四章 欧洲科学对中国的影响 /611

一、明清时期西方科技东传的基本特点 /611

二、耶稣会士提供的天文服务 /612

三、《崇祯历书》与引进西方天文学理论 /614

四、历算需要与西方算学的兴盛 /617

五、天文仪器制造 /618

六、舆地测绘技术 /621

七、火炮制造 /625

八、钟表与其他机械 /628

第二十五章 欧洲艺术东传 /632

一、西洋绘画 /632

1. 西洋画与西洋画师 /632 2. 对中国绘画的影响 /636

二、西洋音乐 /640

三、西洋建筑 /642

第六编 礼仪之争与郅书燕说

第二十六章 中国礼仪之争及其文化意义 /649

一、利玛窦对待中国传统的态度 /649

1. 挪用传统概念 /649 2. 适应传统习俗 /650 3. 利玛窦理解异域文化的特点 /652

二、耶稣会士关于利玛窦方法的争议 /653

三、中国礼仪之争的产生 /655

1. 托钵会士对礼仪问题的异议 /655 2. 耶稣会士的反击 /658 3. 阎当与礼仪之争的转折 /660 4. 奉教士人奋起捍卫传统礼仪 /664

四、罗马教廷与康熙皇帝的往来 /666

1. 铎罗出使与局势恶化 /666 2. 嘉乐出使与礼仪之争落幕 /672

第二十七章 传到欧洲的中国知识 /676

一、16世纪、17世纪游记文献里的中国 /676

1. 16世纪的伊比利亚人作品 /676 2. 17世纪的荷兰人笔记 /680

二、17—18世纪耶稣会士有关中国的著作 /685

1. 报告类：耶稣会士书简 /685 2. 概述类：“民族志” /687 3. 专题类：地图、古史、医药 /690 4. 论辩与经典：与礼仪之争直接相关 /695 5. 耶

耶稣会士著作里的中国形象 /698

三、18世纪中后期的英国游记文献 /700

1. 安森远征与《环球航行记》/701 2. 1793年英国使团的笔记 /703

四、未刊文献 /705

第二十八章 中国形象与启蒙时代 /706

一、耶稣会士的古代中国形象与教会权威的衰落 /706

1. 中国古代编年史问题 /706 2. 中国语言文字观念的变迁 /711

二、确认中国位置的难题 /716

1. 约翰长老的传说 /717 2. 契丹、中国之争的宗教意味 /721 3. 争议的平息与中国位置的确立 /724

三、中国制度与欧洲的社会理想 /729

1. 中国知识与英国的党派斗争 /729 2. 中国政治原则与法国的社会改革者 /733 3. 中国文学作品的道德意义 /739 4. 中国旧制度与欧洲新理想的反差 /741

第二十九章 中国商品与欧洲人的新生活 /745

一、茶叶与英国茶会 /746

二、丝绸与欧洲丝织业的轮替 /751

三、瓷器与制瓷的秘密 /757

四、集中西合璧之大成的外销瓷 /763

1. 迎合欧洲人爱好的中国瓷器 /763 2. 定制瓷器 /765 3. 中国画工绘制的异域风格图样 /767 4. 欧洲人的再加工 /769

第三十章 “中国趣味”与欧洲人的艺术想象 /771

一、巴洛克、洛可可与“中国趣味” /771

1. 巴洛克风格与集权时代 /771 2. 洛可可风格的兴起 /774 3. 洛可可式“中国趣味” /777

二、中国式园林 /780

1. 欧洲关于中国园林的实况介绍 /780 2. 新式园林的内涵与表现 /782

三、其他领域的洛可可式“中国趣味” /786

四、“中国趣味”的沉寂 /790

主要参考书目 /793

索引 /825

后记 /850

第四编 自西徂东与天朝应对

第十七章 地理大发现与欧洲的扩张

一、欧洲开辟新世界的动力

1. 经贸需求

16世纪中叶,欧洲船只经大西洋、太平洋、印度洋,终于实现了直接交通东西的愿望,甚至也来到中国沿海,而这是14世纪以来欧洲人不懈地进行海上扩张的一个辉煌成果,促使欧洲人如此努力的动机有经贸方面的,也有宗教方面的,技术条件的进步则为他们梦想成真提供了重要支持。

促使欧洲在14世纪初开始发生商业革命的基本诱因中有两点与海上扩张直接相关,即对远东产品的需求大增和意大利城市对地中海贸易的垄断。当时国际贸易中占据首要地位的是黄金、香料等东方和北非产品的贸易,它们几乎已是基督教世界文明中不可或缺的一分子。罗马帝国从很早时候起就迷恋食用香料,西方世界继承了这种嗜好。12世纪的西方人已经对东方的香料趋之若狂,当时的烹饪书中介绍各种肉食烹制时,很讲究香料组成的配料,后来发展到除了肉食之外,食用鱼、果酱、汤和高等饮料时也都掺入香料。此外,一些香料还被用于配制药品。香料的另外一个重要用途是腌制各类肉。在漫长的冬天,由于饲料短缺,欧洲人无法在厩中饲养家畜,而秋天宰杀的动物的肉必须腌制以便储存。

但是,对香料几乎无法餍足的渴望和关卡重重的贸易路线形成强烈反差。自古老的丝绸之路梗阻以来,东方商品主要通过波斯湾和红海运往欧洲和非洲北部。在波斯湾一线,商品自波斯湾入口处的霍尔木兹(Hormuz)上行至巴士拉,再由叙利亚和土耳其商人经西亚陆路运往叙利亚或黑海的大港口,威尼斯人、热那亚人和加泰罗尼亚人(Catalans)来这些港口购买。在红海一线,货物多来自马六甲,经印度西南的卡利卡特或阿拉伯半岛南端的亚丁(Aden)进入红海,在埃尔图(El Tûr)或苏伊士(Suez)卸货后由陆路运往开罗,再运至亚历山大,随后,威尼斯、热那亚和加泰罗尼亚商人来此购买,或者由北非的撒拉逊商人从亚历山大运往北非的各地中海港口和内地城市。物品抵达北非和地中海

东岸后,便进入传统的地中海贸易路线。

地中海盆地是欧洲著名的贸易区,通过东部和东方联系,通过中欧和北方联系,通过西欧和西部联系。地中海贸易的内容包括谷物、盐、腌制品、油、葡萄酒、干酪、葡萄干、糖和香料等食品贸易,纺织和矿物等原料贸易,织物、皮革、玻璃等本地工业成品贸易,丝绸、印花布、宝石等进口奢侈品贸易。其中赢利最丰厚的是香料贸易,香料经过一长串交易链条从南亚和东南亚进入亚历山大和的黎波里,再进入地中海之后,便以威尼斯为中心向欧洲各地销售。香料由威尼斯销往意大利北部,穿越阿尔卑斯山到达德国南部和中部,经由海路到达马赛和法国其他地区及西班牙各城市,再经直布罗陀海峡(Strait of Gibraltar)销往西欧和北欧。

在印度航线开辟之前,经由地中海流入欧洲的香料由于数量不多而一直是奢侈品,胡椒和姜首当其冲。胡椒最昂贵之时,可以在欧洲部分地区当货币使用,因为它像黄金一样耐久和容易分成小份,有的地方甚至要求以胡椒缴税。另一方面,地中海沿线各贸易区之间和地中海—欧洲各地的贸易多年来都由意大利各城邦执掌,也令其他国家为支付购买织物和香料的高额费用而头痛不已。西班牙和葡萄牙探索大西洋航路的第一动机就是寻求一条不受意大利人控制的通往东方的道路。

14世纪中叶开始,开辟与贵金属和热带产品生产中心的新通道已不仅仅是个别欧洲国家的需要,而成为整个欧洲的重要贸易问题。因为此时迅速扩张到亚洲中部的伊斯兰世界封锁了商人和传教士在埃及、小亚细亚和里海的常规通道,直逼达达尼尔海峡的奥斯曼政权更成为令欧洲人恐慌的威胁。与此同时,穆斯林仍占领着西班牙半岛很大一部分土地,严重妨碍任何试图超出欧洲地理范围的扩张活动。旧有的东西陆地贸易陷入萎缩和完全中断,但欧洲对东方贸易的依赖和渴望却无法衰退,开辟新的通路成为全欧洲的当务之急,而经水路或陆路穿过非洲到达印度洋被认为是发展贸易的最佳选择,葡萄牙和西班牙的地理位置赋予它们充任这一使命急先锋的天然优势。

2. 精神号召

欧洲的远征传统由来已久,海外扩张在某种意义上是此种传统的继续。浸透基督教的普济主义、改变异端信仰的热情和好战精神是扩张的天然动力,东方在早期频频入侵欧洲也助长了强大起来的基督教世界的好战心理,有关遥远的东方有一位约翰长老(Prestor John / John the Presbyter)统治着一方基督徒国度的传说在中世纪流传不衰,更刺激了欧洲人想与这位约翰长老联合夹击伊斯兰教徒的愿望。海外探险之所以从伊比利亚半岛(Iberian Peninsula)的葡萄

牙人开始,一个重要原因在于,伊斯兰教世界在伊比利亚人眼里是一个长久存在的宿敌,半岛大部分地区曾在穆斯林统治之下,基督徒为收回土地进行过长期的艰苦斗争,直到15世纪,控制北非海岸的穆斯林仍令对岸的伊比利亚人寝食难安,所以,对伊比利亚人来讲,反伊斯兰教的斗争是不可动摇和必须履行的责任。

但是仅有中世纪的宗教精神还不足以鼓舞人们去面对波涛汹涌的大西洋和大洋以外的未知世界,漫长世纪以来,欧洲人所习惯的是地中海相对温和的航海条件,茫茫大海对中世纪的人来说尚是令人恐惧的风暴旋涡。中世纪晚期出现了一种可以统称为“发现的神秘主义”的新精神倾向,它提倡宗教要尊重人和自然界、要热情地在异教徒中争取新信徒以及爱好旅行。从这种新精神中得益的不只是文艺复兴所代表的基督教世界的艺术,也有与征服海洋息息相关的地理科学。而这种新精神不可否认地带有方济各主义的烙印。

意大利人圣方济各(St. Francis of Assisi, 1181—1226)1209年建立方济各会,其三个基本特点是:1. 会士立下赤贫誓言;2. 力图将争取教徒的工作扩展到全球和全人类,特别是异教徒世界;3. 促进人们同时接近神和自然界。这三点深刻影响到中世纪的社会和文化。方济各会以理解和容忍的自由派精神关注并支持普通民众,与天主教上层修士形成鲜明对比,从而一开始就在资产阶级和大众阶层中大受欢迎,这显然是方济各会的主张得以产生广泛社会影响的重要基础。在全世界的异教徒中传播“清贫福音”与为了贸易寻求海外发现可谓异曲同工,所以西方海外殖民活动始终与传教活动相辅相成。方济各会把上帝描绘成有爱心和同情心,把人提升到能与上帝沟通和对宇宙充满博爱的高度,这种用爱心建立所有生物共同体的乐观主义理想深入民众之后,使人类对自然充满了信心和创造力。方济各主义对生活抱有更理性、更人道和更亲切的态度,从而在一定程度上改变了人们对自然界包括海洋的畏惧态度。

方济各主义的一个直接文化后果是催生了热衷观察自然界并热情地鼓吹基督教世界扩张宏图的新地理文学,这些作品以13—14世纪争相自陆地与海洋两线旅行到东方的方济各会修士们的经历为基础,试图重新激活基督教固有的扩张和好战思想。这些基督教地理传奇还鲜明地体现出当时那种扩张主义的思想体系,它相信存在一个奇妙的东方,以“印度”代称,还包括东非,那里存在一个权力无边的教士国王,他希望同被异教徒屏障的西方的基督教社会联合在一起,以便共同击败数百年之敌伊斯兰教徒。

需要注意的是,虽然16世纪开始的海外探险活动渗透着基督教的扩张精

神,虽然土耳其人在欧洲的推进使教会着实感到恐惧,但教会政策并非其中的决定因素。中世纪末期,十字军的战斗精神已经消失,教宗们组织十字军的号召力也已衰弱,罗马教廷只能通过政治上鼓励基督教国王的海外扩张来标示自己的统治权,而这便引出下文即将谈到的“保教权”问题。

3. 科技支持

使航海活动最终付诸实行的是航海技术的进步,其中的关键是船舶建造、船只定位、在地图上准确标定新发现之陆地等一系列技术。

中世纪最后几百年里欧洲人深受托勒密的宇宙结构学和地理学思想影响。一方面,他对地球的错误想象长时期主宰中世纪科学并构成一种认知障碍。托勒密认为人类居住的世界是一块连续不断的陆地,中间包围着一些海盆,并在地图上标明印度洋南面存在一块未知的、因高温而不适宜人类居住的南方大陆(这一错误直到18世纪英国人库克的航行之后才被纠正)。因此,地球是圆形的和存在地球对跖点的思想直到14世纪末都只被一小部分精英所承认。然而从14世纪最后25年起,一本宣扬地球为球状、热带可居住和有可能从已知世界的一极航行到另一极的思想的游记——《约翰·曼德维尔先生游记》(*The Travels of Sir John Mandeville / The Voyage and Travels of Sir John Mandeville, Knight*)开始广为流传并引起人们极大兴趣。到15世纪中叶,许多人已有跨洋航行的想法,并确认从西方不止一个点出发都可实现。1459年,威尼斯卡玛尔迪斯(Camaldolese)的修士弗拉·毛罗(Fra Mauro)绘制了一幅地图,这就是著名的“弗拉·毛罗地图”(Fra Mauro map)^①,图上标明向东走海路可以抵达亚洲。这种见解与托勒密的世界观自然抵触,但是葡萄牙的堂·恩里克王子(Infante D. Henrique, 1394—1460)^②得到这份地图的一个副本后,却被它所鼓舞^③,他领导下的葡萄牙水手便一直努力将这份地图提示的可能性转化为现实。

另一方面,托勒密的天文学和地理学思想对航海科学的形成起到重要作用。在阿拉伯人中很有影响并经阿拉伯人传入基督教世界的托勒密地理天文学和地理数学,在葡萄牙的航海科学中占据显要地位。同时,占星术士的天文学知识也是葡萄牙航海科学的一个资源。葡萄牙14世纪上半叶流行的

^① 这幅地图包括了亚洲、非洲和欧洲的内容,全稿绘制于1448—1459年间,1459年4月24日,被寄往葡萄牙。美国阿波罗14号登月飞船的着陆地月球上的一座环形山,被命名为“弗拉·毛罗环形山”,以纪念毛罗的杰出贡献。该地图的详细版本2006年曾由威尼斯国立马尔恰那图书馆(Biblioteca Marciana)出版。

^② 恩里克王子名字的英文发音为亨利(Henry),故有的场合又作亨利王子。

^③ [美]艾立克·沃尔夫:《欧洲与没有历史的人》,贾士衡译,台北:麦田出版社,2003年,第316页。

四本历书同时也是科普工具书,其中《马德里天文历书》中推算星体位置的规则和城市坐标表对航海具有很大的实用价值,《科英布拉历书》对小时、黄道、经纬度的定义以及推算不固定宗教节日和观测新月的方法后来都融入航海著作中。

大约12世纪传入欧洲的指南针早就在地中海航行中被使用,阿拉伯航海家用于测定天体高度和方位的铜制刻度盘——星盘则早在9世纪之前就为欧洲人所知,但几乎不被使用。13世纪、14世纪地理知识的进步,以及葡萄牙人将航海科学与天文学知识相结合,才使得分别活跃于地中海和印度洋的指南针和星盘共同成为大西洋航海家们远航的重要工具,葡萄牙人得以利用地平纬度航行,发展出一套精确测定纬度的方法。由于星盘造价较为昂贵,很快被结构简单、造价低廉的象限仪取代,著名的如戴维斯象限仪。借助以上条件,航海家能够确定适合的航线并绘制导航图和地图,接下来就是扬帆起航了。

1200—1500年间,欧洲普通船舶的吨位增加了一到两倍,载重600—800吨的圆形帆船成为水面上的主力,13世纪时采用了比侧向操舵装置效率高许多的艏舵。然而若想征服远比地中海凶猛、广袤和复杂的大西洋,还必须有更合适的航船船型,当时包括圆形帆船在内的各种通行帆船都过于粗糙笨重,船舷低而承受不住海浪的袭击,桨手太多而致费用大增,对远航中经常会遇到的无风或逆风天气则缺乏应对力。因此,葡萄牙人在14世纪改造阿拉伯人的三角帆索具制造出三桅帆船,这类船船体比较精致,长宽比超过3:1,没有艏楼或艏堡。三桅帆船的前桅有一道横帆,利于迎风航行。后桅和主桅上是阿拉伯式大三角帆,可以加快航行速度。三桅帆船不仅轻巧精致、适于逆风航行,而且还有更大的优势——在船上装配大炮。欧洲火炮的质量在15世纪已经超过亚洲,配备火炮的船只一半是战舰,一半是商船,于是海战的关键不再是撞击敌舰和登上敌舰,而是以舷侧炮轰击敌船。1500年以后,欧洲船只不仅在上层甲板和船楼上架炮,也在船身开炮门。在威力十足的大炮和三桅帆船帮助下,葡萄牙人和西班牙人接连完成绕行几内亚湾、考察巴西海岸、折过好望角、横渡大西洋和穿越麦哲伦海峡进而环绕全球的航海壮举。此外,活跃于印度洋航线上的葡萄牙战船和货船不仅能够远航,还能运载数量可观的士兵和货物,成为葡萄牙人经营其东方殖民帝国的强大后盾。

当远航成为现实并被娴熟地不断重复之后,不仅局限在狭隘范围内的地中海贸易被扩展成为世界性的事业,还即刻带来贸易额和消费品种类的大量增长,比如香料在印度洋航线开辟以后不久就成为大众消费品,同时贵金属供应

增长。而这一切难免导致各种各样的利益角逐。

二、葡、西两国的海上帝国

1. “保教权”的由来

所谓“保教权”是天主教传教事业上的一种优惠特权,教会在发展的初期因召集信徒帮助修建各种宗教设施而赐予他们各种特权作为回报。到中世纪晚期,这种特权在欧洲本土已经衰落,但随着葡萄牙航海探险开始,它又在海外复兴,在某种程度上是欧洲国家瓜分世界的代名词,而在很长时间里,是葡萄牙和西班牙平分秋色的标志。海外“保教权”能够确立首先应归因于欧洲国家基于宗教精神的共同体认识,它们普遍赞同,基督教国家有权把“野蛮人”和异教徒的土地占为己有而无须顾及土著民族,而且在天主教世界,国王们还承认罗马教宗有权分配任何不为基督教统治者所拥有之地区的世俗统治权。当然,后来欧洲民族国家的利益逐渐上升,教宗的权威日趋衰落,“保教权”的约束力也日益弱化。

无论如何,号召力已经式微的教会通过葡萄牙的声势又看到了以对世俗君主提供政治支持来维护甚至扩大其统治权的希望,而15世纪中叶土耳其帝国在欧洲的扩张使教会的这种需要十分迫切。另一方面,1452—1455年间葡萄牙人往返几内亚的船只一再遭到袭击,提醒葡萄牙人去寻求有力的保护措施。于是,葡萄牙的“航海王子”堂·恩里克向教宗提出包围伊斯兰世界并通过印度人的帮助使其实力枯竭这一计划,计划本身吸引了教宗,而葡萄牙人对撒拉逊人的持续打击亦使教宗信赖堂·恩里克王子的能力。于是,教廷要借助堂·恩里克王子发现全世界的计划在全世界实现其宗教使命,而在航海事业上先行一步的葡萄牙也率先获得了“保教权”。

堂·恩里克王子是葡萄牙国王堂·若昂一世(João I, 1357—1433, 1385—1433年在位)的第三子,生于波尔图。1415年,年仅21岁的恩里克随父若昂一世远征,次年占领了北非摩洛哥城市休达,并出任总督,后来改任葡萄牙阿尔加维省总督。他把自己的小宫廷建在最西南端的小渔村萨格里什(Sagres)。恩里克是个狂热的基督徒,一生都以同穆斯林作战为己任,对约翰长老国度的传说也深信不疑,一心要找到这个据说黄金满地的王国并与之结盟。这种狂热精神使他最终成为葡萄牙航海者的精神教父和葡萄牙早期航海事业的坚强后盾。恩里克王子先在他王宫所在的萨格里什建立了一所航海学校,传播最新航海知识,聚集了一群出色的海员。在他的有效组织下,

葡萄牙集中了当时帆船航海的全部优势力量,具备了南下大西洋探险的基本条件。

此外,恩里克王子还特别强调航海实践,领导了一系列海上探险活动。摩洛哥的休达是直布罗陀海峡及地中海与大西洋间的海上咽喉要道,葡萄牙的探险活动便以此为基地而逐渐展开。头十年,他们主要关心马德拉群岛和亚速尔群岛。1434年吉尔·埃阿内斯绕过博哈多尔角(北纬 26°),这是非洲海岸最凶险的海角之一。嗣后,葡萄牙人开始使用更为安全而迅速的轻快帆船,探险活动更加频繁。1445年,迪尼斯·迪亚斯(Dinis Dias,到达非洲最南端的巴尔托洛梅乌·迪亚斯之父)到达佛得角和塞内加尔河口(北纬 16°),两年后,到达几内亚海岸(北纬 12°)。1460年,葡萄牙航船到达塞拉里昂(北纬 8°)。此后不久,恩里克王子去世。1960年,为纪念堂·恩里克王子逝世五百周年和对于葡萄牙航海事业的贡献,里斯本的特茹河北岸建起一座“大发现纪念碑”,此地也是葡萄牙航海家达·伽玛发现印度洋航路之旅的扬帆之处。此碑远看为一艘别致的石刻巨型帆船,近观则像一柄刺向天空的宝剑。堂·恩里克站立船中,四周站立着协助他的船长、地理学家、数学家、木匠、诗人等。



堂·恩里克王子像

1487年7—8月间,一个小型的船队在巴尔托洛梅乌·迪亚斯(Bartolomeu Dias,约1450—1500)率领下,从里斯本沿着西非海岸南下,当年年底就已经到了后来被称为好望角的南非海角,在这里遭遇了大风,有一个船员不幸遇难,不过,船队依然继续航行,次年2月,他们航行到南非东南部如今被称为伊丽莎白港的地方,这才反向找到了通往印度的航道。但是,他们必须返回向葡王复命,回到里斯本的时候,已经是1488年12月了^①。

堂·恩里克王子的努力为葡萄牙要求“保教权”奠定了基础。15世纪后半叶(1452—1484),教宗颁发一系列训谕维护葡萄牙的海外特权,第一份训谕是1452年6月18日教宗尼古拉五世为葡萄牙国王颁布的《相反的方向》,此外的重要训谕还有1455年1月8日的《罗马最高祭司》(尼古拉五世颁布)、1456年3月13日的《划子午线为界》(加里斯都三世颁布)、1481年6月21日的《不朽的国王》(希斯托四世颁布)。1455年训谕不仅确定已发现的“从博哈多尔角和纳奥角经过整个几内亚并从几内亚到南方的地方”永远属于葡萄牙王室,而且把“已经获得的或将来终要获得的海外省、岛屿、港口、地方和海洋作为永久产业赐给那位堂·阿丰索国王、他的继承人和王子,不论其大小、数量和特性如何”,甚至以革除教籍相威胁,禁止其他任何人在没有葡萄牙国王和王子特许的情况下插手这些地方。训谕也批准了葡萄牙人在所到之地的各种宗教权利^②。该训谕的一个特点是未加限制地赋予了葡萄牙人征服的权利。1456年的《划子午线为界》将已发现的或待发现的从博哈多尔角和纳奥角经几内亚直到印度人中间的所有南方土地的宗教管辖权赋予葡萄牙天主教骑士团(1443年成立,堂·恩里克王子任统领),相当于承认这些土地的主权属于葡萄牙王室。1481年的《不朽的国王》首先是与下文要述及的葡、西条约有关,但同时将葡萄牙的发现权利扩展到印度洋。这些训谕的另一个特点是,被郑重通报欧洲所有国家,从而使得葡萄牙人垄断的特许状具有国际法的性质。此种做法的效果显而易见,自1455年训谕颁布后,西班牙人在近四十年里都遵守它们,堂·恩里克的发现事业在这期间得以不受干扰而蒸蒸日上。直到1484年9月12日,教宗英诺森八世(Innocent VIII, 1432—1492)仍在颁布有利于葡萄牙人的训谕,但此后形势发生逆转。

西班牙长期遵守教宗训谕的一个重要原因是内部封建割据导致国力衰弱,

^① 关于迪亚斯的探险历程,参见[英]罗杰·克劳利:《征服者:葡萄牙帝国的崛起》,陆大鹏译,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6年,第35—40页。

^② 该训谕主要内容参见[葡]雅依梅·科尔特桑:《葡萄牙的发现》第二卷,王华峰等译,北京:中国对外翻译出版公司,1997年,第519—523页。

从而无力进行海外扩张。与之相反,葡萄牙的社会结构统一,统一的基础是倾向向外扩张的天主教,从事航海事业的资产阶级是其最稳固支柱,而国王则是航海商人教友会最富有、最高贵的象征。不过,葡萄牙的强大和独立都依赖于海外事业,因此对其海外贸易基地的几次成功打击就足以给它造成致命损伤。西班牙人虽尚不能发现新土地,却很快明白葡萄牙这一弱点,在15世纪中期就开始袭击和劫掠自几内亚返回的葡萄牙三桅帆船。1469年卡斯蒂利亚的伊莎贝尔与阿拉贡的费尔南多结婚,两国于1479年合并,此间西班牙野心逐渐膨胀,1476年起与葡萄牙人展开海战以争夺在非洲和几内亚的权利。战争中,葡萄牙虽屡次得胜,却也无心恋战而急于保护海外贸易活动,西班牙的两个王国则因战争而愈加分裂和贫困。因此两国通过谈判于1479年9月4日签署《阿尔卡苏瓦什和平条约》,条约中西班牙承认了葡萄牙在几内亚的主权,而葡萄牙承认西班牙卡斯蒂利亚和阿拉贡国王在加那利群岛的主权。西班牙国王和葡萄牙国王先后于1480年3月和9月批准条约。条约并于次年通过教宗训谕《不朽的国王》得以确认并生效。签约后的西班牙显然不满足于此,1492年哥伦布在伊莎贝尔女王支持下到达美洲,使西班牙具有了海外发现的资本;而于1479年授予西班牙君主夫妇“天主教双王”称号的教宗亚历山大六世(Alexander VI, 1431—1503)为西班牙籍,这些有利条件促使西班牙满怀信心地将葡萄牙拉回谈判桌,缔结著名的《托尔德西拉斯条约》。

在谈判过程中,教宗亚历山大六世首先应西班牙国王的要求颁布了一系列偏向西班牙的训谕。1493年5月3日颁布第一份训谕《相互共存》,将先前不为人知,现已被哥伦布所发现的大洋的西方、朝向印度方向的陆地和岛屿的主权,以及其他在这个方向的尚未被发现的未处于任何基督教国王和亲王临时控制之下的陆地和海岛的主权,均授予西班牙君主。不久,西班牙拒绝了葡萄牙以加那利群岛所在的纬度线划分南北势力范围的提议,并促使教宗于6月颁布一份新的训谕《相互共存》,作为对5月3日训谕的修订,其中规定以南极或北极为起点,在离亚速尔群岛或佛得角群岛100里格处划出一条界线,这条线以西和以南发现的和有待发现的、1493年以前任何基督教国王和亲王不对之享有主权的海岛与陆地均被教宗授予西班牙君主。7月,又颁布第三份特别训谕,额外强调西班牙君主可以在他们的新领土上行使罗马教廷授予葡萄牙国王的相同的权力,即领土主权和宗教管辖权。最后一份训谕《最新情况》标注9月26日签发,不仅废除了以亚速尔群岛和佛得角群岛一百里格处的经线来划分势力范围的明确说明而退回到第一份训谕的模糊表述,还废除了前几任教宗授予葡萄牙历任天主教骑士团统领的特权,并吊销了他们在西方所发现土地的全部所有权声明书。